

屈原東渡——韓國古代文人
作品中的屈原意象¹

范永聰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一、引言：「屈原意象」之形成

柯慶明教授在其〈中國文學之美的價值性〉一文中，對屈原（約前 340- 約前 278）及《楚辭》之「美」，有以下一段描寫：

屈原使《楚辭》基本上反映出一種由家居、由京城被逐，而於上下四方徬徨流蕩、痛苦追索的無處安心，無家可歸的遠別流浪情懷。這種孤臣孽子的處境，一方面導致了對於家國的更大的渴思，一方面也促成了個人自我生命的獨特性的醒覺，以及對文明與社會之本質的反省。……它（筆者按：《楚辭》）透過一種高卓的文化理想，一種廣博的歷史知識，以一種憂心如焚的激切之情來關懷國家社會，來抨擊時代的墮落，人們的謬誤。它的美是一種對於高遠的理想的執著追尋之美。假如《詩經》反映的大體是常人之情的話，《楚辭》中反映的卻是屈原的志士哲人的憂國憂世之情。因此它的美也同時是偉大人格的自我流露之美。……屈原不但成為中國第一個面目鮮明的詩人；而且《楚辭》也開啟了以詩人自身人格為表現的偉大的詩歌傳統。²

這段文字，精準呈現「屈原意象」的四大特點：一、他擁有高遠理想——即東亞傳統士大夫普遍呈現、往往建基於儒學對於君子基本修養的「修齊治平」式人生理想；二、身為高級官員，

屈原熱愛祖國、關懷社稷、憂國憂民；三、屈原容易令人聯想到「志士哲人」的形象；四、屈原於亂世中懷才不遇、其有志難伸所引起的哀愁，往往為此後歷代擁有高遠理想的知識分子繼承。³

學者們還注意到，屈原的生平及其一生所演繹的詩人形象，以至其文學作品，在後世廣為流傳並不斷被知識分子傳承與模仿。⁴ 屈原是忠君愛國式典型「符號」，⁵ 此一濃烈的愛國詩人形象，樹立給予後世文人爭相模仿的範式。他也是悲劇英雄類型典範人物，容易與有雷同經歷的後人建立基於意識上的超時空連繫。由是，屈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內某一種理想境界。及後，古代東亞世界也在漢字文化的東漸及主導下，慢慢學習與吸納相關文化意涵，實現「屈原在地化」的過程，韓國正是顯例。⁶

談及所謂「屈原意象」，其相關文化意涵頗見廣泛而抽象；後世知識分子往往關注《離騷》，試圖從中窺見一二。南宋（1127-1279）朱熹（1130-1200）注釋《離騷》中「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一句時，有云：「兩美，蓋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言兩美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修潔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⁷ 依朱氏所言，屈原於《離騷》中，即以「美人」比喻「賢君與忠臣」，藉此表達他本人對於君臣之間完美關係的追求。李健於其著作《比興思維研究：對中國古代一種藝術思維方

式的美學考察》中提到：「《離騷》出現的種種意象都是隱喻、象徵式的，但其內在所經歷的磨難卻是非常真實的。屈原反覆表達自己的高潔品格，忠貞及其為小人奸佞所中傷的悲慘經歷，然其對君主（懷王）之愛卻是熾烈真誠。」⁸ 從這個角度出發觀察，屈原的愛國詩人形象，顯見清晰。

兩漢（前 202-220）是「屈原意象」形成的關鍵時期。漢人筆下的屈原，主要呈現兩大形象特徵：一、屈原是「士」的代表人物，但他飽受挫折、懷才不遇；二、屈原是「忠臣」，但他為君主所棄、屢遭貶謫。然而，此等悲慘遭遇無損其濃烈愛國情感。由是，屈原自漢代起，便被建構成愛國的悲劇詩人，對後世的文學創作帶來深遠影響。⁹

屈原於漢代時為世所識，或得力於太史公司馬遷（前 145 或前 135- 前 90）的記錄。司馬氏於〈太史公自序〉中形容屈原：「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¹⁰ 於〈屈原賈生列傳〉中又云：「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¹¹ 由是，屈原的鮮明形象，已由太史公樹立，後世因而有所依循。¹²

除司馬遷外，兩漢文人於個人生平感悟或文學創作上試圖與屈原建立緊密連繫者，也有多例，諸如：西漢中期嚴忌（約前 188-

前 105) 撰《哀時命》，當中有名句如：「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遭時」、「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沉抑而不揚」及「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等等，¹³ 至東漢 (25-220) 王逸 (約 89-158) 撰《楚辭章句》中收錄之，王注謂：「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¹⁴ 范曄 (398-445) 撰《後漢書》中〈梁統列傳〉載：「竦〔筆者按：梁竦 (? -83)〕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¹⁵ 又《後漢書》卷四十八〈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中謂：「及黨事起，奉〔筆者按：應奉 (生卒年不詳)〕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¹⁶ 可見兩漢之世，深受屈原其人其事及文學作品影響者，實不在少數。

不過，屈原的形象也絕非完美。兩漢名臣如賈誼 (前 200- 前 168) 及班固 (32-92)，都曾撰文批評屈原。賈誼撰《弔屈原賦》，在對「屈原意象」有所感召、並對屈原的生平經歷深感同情的同時，卻也質疑屈原何以堅執尋死。其文有云：「鳳漂漂其高邈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¹⁷ 班固撰〈《離騷》序〉，批評屈原性格過於偏激，甚至其自沉汨羅，更是陷楚王於不義之舉，有損「為臣之道」。¹⁸ 可

見自漢代以來，知識分子對於屈原的評價，並非全盤正面。如此褒貶不一的看法，及後東傳至朝鮮半島，在韓國古代知識分子認識屈原的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¹⁹

※ 二、屈原「東渡」——兼談李奎報撰 《屈原不宜死論》

關於屈原的作品如何東傳至朝鮮半島，由於史無明載，現今只能知其梗概。其中一個合理猜測，屈原及部分《楚辭》作品可能伴隨司馬遷所撰《史記》及南梁（502-557）蕭統（501-531）所編《昭明文選》東傳朝鮮半島。太史公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引錄屈原所撰《離騷》、《漁父》及《懷沙》等作品部分原文，並提及《天問》與《哀郢》，對屈原生平事蹟及其精神亦有所介紹。²⁰ 據韓國現存最古官修正史——高麗朝（918-1392）名臣金富軾（1075-1151）所撰《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記載，高句麗（前37-668）小獸林王〔高丘夫（？-384），371-384在位〕二年（372）於國內設立「太學」，教育子弟，²¹ 按《周書》〈高麗傳〉記載，其時高句麗太學中的教材有《五經》、《三史》及《三國志》等，²² 而《史記》即屬《三史》之一。由此可作推測，至遲在公元四世紀時，《史記》已東傳至朝鮮半島北部——時高句麗為半島上大國，統治今日漢江以北廣大領土，該國國內知識分子接觸到屈原的作品，應屬合情合理。²³

又《舊唐書》〈高麗傳〉載：「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²⁴ 可知唐代（618-907）

之時，《昭明文選》已東傳至高句麗，並為其國人「愛重」。《昭明文選》卷三十二及三十三選錄王逸撰《楚辭章句》部分內容，屈原所作《離騷》、《東皇太一》、《湘夫人》、《雲中君》、《湘君》、《山鬼》、《少司命》、《涉江》、《卜居》及《漁父》等作品盡在其中，²⁵ 由是高句麗國內已見屈原作品，這亦為此後韓國歷代文士領會「屈原意象」及模仿《楚辭》作品奠下重要基礎。統一新羅時期（668-901），《昭明文選》更成為貴族子弟教育中的重要科目，中國文學作品對韓國文學的發展由是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²⁶

及至宋代（960-1279），朱熹撰《楚辭集注》問世，成為歷來最有系統而又影響深遠之《楚辭》注本。²⁷ 高麗末大文豪李齊賢（1287-1367）曾在其名作《櫟翁稗說》後集卷一中指出，其家中藏有朱氏注本，他本人亦已閱讀。²⁸ 可見《楚辭》在當時已東傳至朝鮮半島上的王氏高麗王朝。

班固對屈原的批評，似乎也伴隨《楚辭》東傳，在朝鮮半島上得到傳承。高麗名相李奎報（1168-1241）撰有《屈原不宜死論》一文，其見解與上文提及班固對屈原的批評可謂同出一轍。²⁹ 李奎報在文中說：

古有殺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殺身以成節者，若伯夷、叔齊是已。比干當紂時，其惡不可不諫，諫而被其誅，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紂，猶有慙德，凡在義士，不可忍視，故孤竹二子，扣馬而諫。諫而不見聽，恥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節也。若楚之屈原，舉異於是，死不得其所，祇以顯君之惡耳。夫讒說之蔽明，邪諂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國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為王寵遇，專任國政，宜乎見同列之妬嫉也。故為上官大夫所譖，見疏於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為恨者也。原於此時，宜度王之不寤，滅迹遠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惡，漸久而稍滅也。原不然，復欲見容於襄王，反為令尹子蘭所讒，放逐江潭，作湘之纍囚。至是雖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澤畔，作為《離騷》，多有怨曠譏刺之辭，則是亦足以顯君之惡。而迺復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為競渡之曲，以慰其溺；賈誼作投水之文，以弔其冤，益使王之惡，大暴於萬世矣。湘水有盡，此惡何滅！……若懷王則聽讒疎賢而已，當時此事，無國無之。原若不死，則王之惡，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而顯其君之惡耳！」予之此論，迺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貶其君之惡，庶以諷後之信讒斥賢耳，非固譏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嗚呼！³⁰

觀李奎報之文，他並非不同情屈原的遭遇，只是屈原撰述《離騷》，自沉汨羅，誠如班固所言，是偏激舉動，非但對楚國無益，更只是「顯君之惡耳」。對李奎報來說，屈原作為高級官員，被其他大臣進讒，實在是正常不過的事。他未能選擇「滅迹遠遁，混于常流」，反而撰文譏諷君主，走上自盡的不歸路。此舉雖然引來後人不斷紀念憑弔，但同時也大大破壞楚王的形象和聲譽，絕非忠臣所為。³¹

※ 三、韓國古代文獻中呈現的「屈原意象」 —— 若干作品介紹

韓國古代文獻中，不乏自比、評論屈原，或於文章內容中明確反映「屈原意象」者。此處茲舉數例，以為說明。

其一、尹彥頤：《廣州謝上表》。尹彥頤（1091-1150），高麗仁宗〔王楷 / 王構（1109-1146）、1123-1146 在位〕朝登第，歷任起居郎、國子司業，曾赴經筵講論經義，後遷寶文閣直學士。仁宗幸國子監，命金富軾講論《易經》，並請尹彥頤「問難」。尹氏精於《易經》，席間一時忘形，不斷詰問，使金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面」，由是懷恨在心。不久，金富軾上表彈劾尹彥頤與左司諫鄭知常（？-1135）結黨營私，尹氏因而於仁宗十四年（丙辰，1136）五月被貶至梁州出任防禦使。及後於地方上屢遷官職，「坐廢六年」。³² 尹彥頤嘗撰表文，以為辯解，題為〈廣州謝上表〉，文中有云：

昨於丙辰五月，被中軍（筆者按：時金富軾出任中軍一職）彈奏，奉勅落臣行職，受梁州防禦使。臣卽日奔去，越戊午年，伏蒙聖慈，除臣廣州牧使兵馬鈐轄管勾學事，禮部侍郎，許令催赴。至庚申十二月，朝謝並得施行，今已拜官者，坐廢六年。分已甘於萬死，銜恩一旦，勢若出於再生。……竊

以上之馭下，莫不欲忠，臣之事君，期於見信，然不可必，故或相乖。周公不免於流言，絳侯〔筆者按：漢初周勃（？-前169）、周亞夫（？-前143）父子〕尙遭於繫急。望之〔筆者按：蕭望之（？-前46），漢元帝（劉奭，前75-前33；前49-前33在位）帝師〕帝之傳也，終於飲毒；屈原王之親也，卒以沉江。聖賢猶或如之，庸瑣何足算也？³³

尹彥頤於此表箋中尊稱屈原為「聖賢」，其對屈原的評價與李奎報大相徑庭。他雖然謙虛地形容其被貶經歷是「聖賢猶或如之，庸瑣何足算也？」但從文意中也可清楚察見，他把自己的經歷比附屈原，從中可見「屈原意象」對韓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巨大影響力。「貶謫」成為尹彥頤與屈原兩人之間最重要的連結——有着這種不幸的類同經歷，尹彥頤在其作品中提及屈原的事蹟，也自然屬於一種理所當然的情感投射。³⁴

其二、林椿：〈上按部學士啟代人行〉。林椿，生卒年不詳，或謂與李奎報為同時期人，號西河，有《西河先生集》傳世。武臣鄭仲夫（1106-1179）亂起〔「庚寅之亂」，高麗毅宗二十四年（1170）〕，矢志盡殺文臣，林椿整家蒙難，獨他一人逃脫。其人文名甚大，科舉卻每每落第，終以布衣身份辭世。據《高麗史》〈李奎報傳〉記載，林椿與李仁老（1152-1220）、吳世才、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人組織「竹林高會」，閒時遊於山野木林，醉酒賦詩，當中林椿與李仁老實為骨幹人物。他們二人文名之大，

被認為於高麗中期首屈一指。³⁵

林椿一生致力功名，卻最終布衣辭世，如此生平，與「屈原意象」當然十分契合。在其〈上按部學士啟代人行〉一文中，他用一句說話來形容何謂「上佳文章」，他說：

博如莊周，哀如屈原，明如賈誼。³⁶

他說「哀如屈原」——屈原的名作《離騷》，正是「哀」這種情緒的代表作。不受君主重用，雖然心繫國家，然眼見國家將亡也無能為力，最終還落得「自沉汨羅」的下場，這無疑是一種「哀」，深刻展現屈原作為「孤臣孽子」的悲傷心情。林椿認為屈原的文章中能散發一種「哀」的感覺，並感召後代文人，絕對是最成功的文學作品；而這種哀愁，也是他們二人情感連結所在。³⁷

其三、權近：〈《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序〉。朝鮮初年著名性理學者權近（1352-1409），撰有〈《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序〉一文，其文中有言：

文章，隨世道升降，是蓋關乎氣運之盛衰，不得不與之相須。然往往傑出之才，有不隨世而俱靡，掩前光而獨步者矣。昔屈原之於楚，淵明之於晉，雖當國祚衰替之季，而其文章愈益振發，燁然有光，且其節義凜凜，直與秋色爭高，足以起

萬世臣子之敬服，其有功於人倫世教為甚大，獨其文章可尚乎哉？星山陶隱李先生，生於高麗之季，天資英邁，學問精博，本之以濂洛性理之說，經史子集百氏之書，靡不貫穿，所造既深，所見益高，卓然立乎正大之域。至於浮屠老莊之言，亦莫不研究其是否。敷為文辭，高古雅潔，卓偉精緻，以至古律併儷，皆臻其妙，森然有法度。³⁸

權近此文，固然旨在稱讚高麗末期大文豪之一李崇仁（1347-1392）的驚世文才，但他對屈原的高度評價，也值得注意。權近認為屈原不單止文章出眾，而且人格「節義凜凜」，甚至可與「秋色爭高」，為「萬世臣子敬服」，更「有功於人倫世教」。這種觀點，可說是直接繼承上文所述、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對於屈原的主流評價。³⁹

其四、鄭夢周：《思美人辭》。鄭夢周（1337-1392），字可達，號圃隱，諡號文忠。高麗末期著名性理學家，有「東方理學之祖」的美譽。他活躍政壇之時，適逢李成桂〔後來之朝鮮太祖（1335-1408），1392-139 在位〕勢力崛起。圃隱作為高麗忠臣，寧死不願歸順李成桂勢力，並決心與之抗衡到底，最終被李成桂五子李芳遠〔後來之朝鮮太宗（1367-1422），1401-1418 在位〕暗殺而死，卒年五十有六。其為高麗守節而終，被後世文人奉為韓國歷史上其中一位「忠臣」代表人物，而其對於韓國古代性理學發展的貢獻，更為後世儒者稱道。⁴⁰

《思美人辭》的創作，從作品命題、體裁，以至內容各方面都明顯模仿屈原的《思美人》，其全文為：

思美人兮如玉，隔蒼海兮共明月。
顧茫茫兮九州，豺狼當道兮龍野戰。
繼余馬兮扶桑，悵何時兮與遊讌。
進以禮兮退以義，搢紳笏兮戴華簪。
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何為兮江之南。⁴¹

本辭在篇幅上，固然遠遠不及屈原之《思美人》；在體裁上，結構較為隨意，亦不及屈原之嚴整；「兮」字之應用，固為學習《楚辭》書寫特色而作，然亦非本辭之最大特色。⁴²

鄭夢周所撰《思美人辭》的最大特點，是它與屈原所撰《思美人》在意象上的緊密傳承。「美人意象」是這兩首作品的共通點，也是見證鄭夢周如何把自己的經歷及心志投射到屈原身上的最重要證據。⁴³ 屈原於《思美人》中，致力表達的仍是強烈的愛國及忠君思想，他所思的「美人」，固然就是楚王，⁴⁴ 然而他同時抱怨國君貪圖安逸。他雖然抱有遠大理想，但亦明白現實與自己的理想之間存在鴻溝。由是，他為了實現理想，已做好為國殉節的準備。⁴⁵

鄭夢周的《思美人辭》，在創作思路與屈原之《思美人》非常

相近。首句「思美人兮如玉，隔蒼海兮共明月」明顯是表達思君之情，同時也可解作為對政治清明的期盼，蓋因之後數句，都表達了鄭夢周心中的理想世界，如「進以禮兮退以義」，就是明證。第二句「顧茫茫兮九州，豺狼當道兮龍野戰」可說是全辭精髓所在。鄭夢周對於當時高麗末期政局之擔憂，以及其愛國熱情，於這句中表露無遺。所謂「龍野戰」，出自《周易》〈坤卦〉〈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寓意政局紛亂，外患頻仍。⁴⁶這是高麗晚期國勢的真實反映——國內有野心勃勃的新興勢力李成桂集團崛興，造成黨派傾軋，王權旁落；國外外患頻仍，既有來自日本的倭寇，而新興的明朝（1368-1644）對高麗來說，是否重大外患仍是未知之數。⁴⁷第三句提及「繼余馬兮扶桑，悵何時兮與遊讌」，意指鄭夢周出使日本之經歷。由於麗末倭寇嚴重，鄭夢周曾作為使節出使日本，請求日本政府出兵共抗倭寇。⁴⁸從此文句看來，即使鄭氏因身負要職而遊於海外，仍難忘記祖國及國君。⁴⁹

要之，在鄭夢周的《思美人辭》與屈原的《思美人》內容中，都能清楚看到一個共通點：強烈的忠君愛國情緒，卻伴隨極大的無力感。兩辭中的「美人意象」訴說忠臣對君主的忠心和強烈情感，然而生於亂世卻讓兩位文人同樣感到無力回天。屈原生於戰國時代，鄭夢周生於麗末鮮初。兩個亂世，一個在中國，一個在韓國，在時間上相差接近一千七百年。然而，出於同樣的個人情操與志向，竟讓鄭夢周找到投放個人情感的空間，因而創造出旨

在連繫屈原所作《思美人》的《思美人辭》。由此足見，「屈原意象」在古代韓國的影響力可謂奇大，竟然可以跨越時空，把兩位生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人緊密連繫起來。⁵⁰

※ 四、結語：意象延伸——魯迅也「東渡」？

韓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屈原意象」描寫，絕非突然出現。鄭夢周所撰《思美人辭》，代表了長久以來一種來自中國的、由中國歷代文人「人為而成」的文化意涵——「屈原意象」此一獨特文學元素，如何被韓國古代知識分子接受，並幫助他們在創作文學作品時完成「個人形象投射」的過程。⁵¹「時代」在這個「投射」的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屈原與鄭夢周同樣生於亂世，亂世賦予的「哀愁」和「無力感」等等「時代特徵」，讓創作中的投射過程更為流暢，兩者之間的契合也更形完美。⁵²

若從知識生產的角度出發，「屈原意象」東傳朝鮮半島，其影響也是極為深遠。作為一種文化意涵或概念，「屈原意象」成為極受李氏朝鮮王朝（1392-1910）時代一眾文人歡迎的創作靈感來源。⁵³朝鮮時代著名文人如金時習（1435-1493）、李睟光（1563-1628）、李瀾（1681-1763）及朴齊家（1750-1815）等，部分文學作品往往受到「屈原意象」和《楚辭》作品特色的啟發。⁵⁴屈原作為一位憂國戀主的愛國詩人，其懷才不遇的個人事蹟也感召深受性理學儒家思想影響的韓國古代一眾文人，由是大量模仿《楚辭》體裁的文學作品不斷湧現。⁵⁵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歷代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士的仰慕及興

趣，活像一種文化傳統。近代韓國飽受日本帝國主義欺凌，民族主義高漲，活於日治下的韓國文人或志士，在致力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時，也對韓國傳統文化作出嚴厲的批評。他們注意到在中國，有一位名叫魯迅（周樹人，1881-1936）的作家，奮力在其作品中無情地鞭撻中國傳統文化——指出過時、落後的「舊文化」是國家積弱的元兇。於是韓國知識分子們努力把魯迅的作品引入朝鮮半島，向韓國人廣泛介紹，造成「魯迅也東渡」此一有趣情況。⁵⁶ 1925年，朝鮮知識分子柳基石〔柳樹人（1905-1980），他因崇拜魯迅而把筆名定為「柳樹人」〕會見魯迅，請求允許翻譯其作品《狂人日記》為韓文版本，獲魯迅答允。1927年，韓文版《狂人日記》在韓文雜誌《東光》上刊載。柳樹人於譯序中提到：「魯迅不但寫了『中國狂人』；也寫了『朝鮮狂人』。」⁵⁷ 這句說話，精準地把當時兩個國家和民族的實際處境連結起來。

中國文人筆下的「意象」，在韓國找到最上乘的連繫，並由韓國知識分子致力發揚。這不單單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朝鮮半島影響的明證，更是韓國如何傳承中國文化，並利用之作為近代整個「東亞文化圈」對世界的回應。這牽涉到中、韓兩國長久以來在文學交流與生產上的緊密聯繫，從學術角度來看，當中尚有甚大研究空間，值得繼續深入開發及研討。

注釋

- 1 筆者有幸於 2022 年 11 月 5 日出席由香港新亞研究所主辦「誠明圓桌：中國古典文學在日韓流轉」講座，報告題為〈屈原東渡——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本文稿即由是次講座內容編訂而成，至於當天講座內容則由筆者於大韓民國서울（首爾）大學校人文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亞文化》第 54 輯（2016 年 12 月）上發表之〈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一文（頁 67-97）修訂而成，特此說明。又於「誠明圓桌：中國古典文學在日韓流轉」講座上幸得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李向昇博士擔任主持，並能與同場講者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許建業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商海鋒博士，以及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現為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羅樂然博士就東亞文化交流史此一課題深度交流，筆者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 2 原文節錄自柯慶明：〈中國文學之美的價值性〉，載柯慶明著，王德威編：《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 24；現轉引自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載大韓民國서울（首爾）大學校人文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亞文化》，第 54 輯（2016 年 12 月），頁 67-68。
- 3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68。
- 4 學者張榮翼及李松提及著名詩人田間（1916-1985）及作家郭沫若（1892-1978）均高度肯定屈原其人其文在中華民族文化上的重要性。詳見張榮翼、李松：《文學理論新視野》（臺北：新銳文創出版社，2012），頁 195-197。
- 5 關永中在其著作《神話與時間》中指出，「符號」（Symbol）或「記號」（Sign），常見於神話故事及相關人物之中，試圖傳遞潛藏訊息。這種訊息與某種象徵意義關係至為密切，往往潛藏在描繪具體事物、現象或人物的「表層義」（Literal Meaning）之下，是為「潛伏義」（Latent Meaning）。「符號」或「記號」，是解開這層「潛伏義」的鑰匙。見關永中：《神話與時間》（臺北：臺灣書店，1997），頁 9-11。
- 6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70、72-73。
- 7 〔南宋〕朱熹撰：《楚辭集注》（香港：中華書局，1972），頁 19-20。
- 8 李健：《比興思維研究：對中國古代一種藝術思維方式的美學考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 119。
- 9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73；並參范炯主編：《歷史的祭品：懷怨的忠魂》（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頁 79-80；魯瑞菁：〈論王逸《楚辭章句》的聖人觀〉，載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主編：《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第一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頁 48-49、51、62。

- 10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 3314。
-
- 11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 2842。
-
- 12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74。
-
- 13 〔漢〕嚴忌撰：《哀時命》全文，顯見「生不逢時，懷才不遇」之悲嘆。其全文見〔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民〕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72），頁 158-163。
-
- 14 〔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民〕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楚辭》卷第十四〉，〈《哀時命》章句第十四〉，頁 158。
-
- 15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1170。
-
- 16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1609。
-
- 17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 2494-2495。
-
- 18 〔漢〕班固撰〈《離騷》序〉中云：「……《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絮狂狷景行之士。」見〔漢〕班固：〈《離騷》序〉，載〔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民〕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卷第一〉，〈《離騷經》章句第一〉，頁 29。
-
- 19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80。
-
- 20 詳見〔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 2481-2491。
-
- 21 〔高麗〕金富軾撰，趙炳舜編：《增修補註三國史記》（서울特別市：誠庵古書博物館，1986），頁 299。
-
- 22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頁 885。
-
- 23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81。
-
- 24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5320。
-
- 25 江增慶編著：《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頁 45-47；並參琴知雅：〈歷代朝鮮士人對《楚辭》的接受及漢文學的展開〉，載《職大學報》，2012 年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16。
-

- 26 朴晟義：《韓國文學背景研究》（서울特別市：예그린出版社，1978），頁 552-553。
- 27 羅建新、梁奇編撰的《楚辭文獻研讀》一書中指出，朱熹注釋本《楚辭》問世以後，為歷代《楚辭》研究者奉為極重要的參考文本之一，影響異常深遠。詳見羅建新、梁奇編撰：《楚辭文獻研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191-192。
- 28 《櫟翁稗說》中云：「屈原有《天問》，子厚〔筆者按：柳宗元（773-819）〕隨而答之曰《天對》，俱險澁難讀。吾家有朱晦菴〔筆者按：朱熹〕註，讀之，所謂煥然冰釋，怡然理順者也。」見〔高麗〕李齊賢：《櫟翁稗說》後集卷一，載〔高麗〕李齊賢撰，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益齋先生文集》（서울特別市：景仁文化社，1999），頁 134。
- 29 班固對屈原的批評，見於〔漢〕王逸撰《楚辭章句》之內，而此書內容已為《昭明文選》收錄，並於高麗立國以前東傳朝鮮半島。由是，李奎報於《屈原不宜死論》內所表達的見解，不妨視之為班固意見在古代韓國的傳承。參閱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83-84。
- 30 〔高麗〕李奎報：《屈原不宜死論》，載〔朝鮮〕盧思慎、〔朝鮮〕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第四冊（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70），頁 18-19。
- 31 范永聰於其文〈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中指出，王氏高麗王朝於公元 958 年起仿照中國科舉制度，開科選士。至李奎報身處的公元十二、三世紀時，高麗科舉已成定制，並奉行二百餘年之久，中國傳統儒學中的忠君愛國思想已然根深柢固。由是，李氏對於屈原有所批評，可說不難理解。見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85-86。
- 32 〔朝鮮〕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第三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頁 117-118。
- 33 節錄自〔高麗〕尹彥頤：〈廣州謝上表〉，載〔朝鮮〕盧思慎、〔朝鮮〕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第二冊（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70），頁 107。（全文篇幅頗長，刊於頁 107-109；並見於〔朝鮮〕鄭麟趾等纂：《高麗史》第三冊，頁 118-120）
- 34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88。
- 35 趙潤濟著，張璉瑰譯：《韓國文學史》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 108-109；並參〔朝鮮〕鄭麟趾等纂，〈高麗史〉第三冊，〈李奎報〉，頁 193。又「竹林高會」一名，源於對中國古代「竹林七賢」之思慕，蓋當時王氏高麗朝政敗壞，武臣當權，不少文人厭棄政治，寄情山水閒樂及文學創作。詳見朴晟義：《韓國文學背景研究》，頁 43；並參李家源著，趙季、劉暢譯：《韓國漢文學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 138。
- 36 〔高麗〕林椿：〈上按部學士啟代人行〉，載〔朝鮮〕盧思慎、〔朝鮮〕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第二冊（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70），頁 269-270。

- 37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89-90。又著名韓國文學史家李岩教授著有《朝鮮文學的文化觀照》一書，書中指出林椿一生都沉淪於理想與現實的角力之間，縱有驚世文才，最終卻為科舉制度所害。李岩教授的看法，有力說明林椿的人生確是一種「哀」的現實寫照。他與屈原之間的契合，可說是天衣無縫，「屈原意象」在林椿身上展現巨大效果。相關分析詳見李岩：《朝鮮文學的文化觀照》（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111-123。
- 38 〔朝鮮〕權近：〈《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序〉，載〔朝鮮〕盧思慎、〔朝鮮〕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第三冊（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70），頁 396。
- 39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91。
- 40 有關鄭夢周之生平，詳見〔朝鮮〕鄭麟趾等纂：《高麗史》第三冊，頁 442-453。
- 41 〔高麗〕鄭夢周：《思美人辭》，載〔朝鮮〕盧思慎、〔朝鮮〕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第一冊（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70），頁 122。
- 42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92。
- 43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92-93。
- 44 王逸認為屈原所指「美人」就是楚懷王，舊注及歷來《楚辭》研究者多依此說。詳見〔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民〕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楚辭》卷第四〉，〈《九章》章句第四〉，〈思美人〉，頁 87。
- 45 有關屈原撰《思美人》之寓意，詳見馬茂元主編：《楚辭注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313-314。又王逸注文曰：「此章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修飭，死而後已也。」見〔漢〕王逸撰，〔宋〕洪興祖補注，〔民〕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楚辭》卷第四〉，〈《九章》章句第四〉，〈思美人〉，頁 87。
- 46 陳應鸞：《中國古代文論與文獻探微》（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 342-343。
- 47 有關麗末之內外國勢與時局，詳見李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臺北：正中書局，1991），頁 247-256；並參簡江作：《韓國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8），頁 230-236。
- 48 有關鄭夢周使日始末，詳見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2009），頁 148-149。
- 49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93-94。
- 50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94。

- 51 金烈圭教授在其名作《韓國文學史——그形象과解釋》中指出，於個別層面有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或會被後世視為「文化英雄」，並往往成為後代文人作品中的「投射對象」。他以此現象解釋韓國古代部分文學作品的形成過程，並視之為「文學創作之重要素材」。關於「文化英雄」論點之種種，詳見金烈圭：《韓國文學史——그形象과解釋》（서울特別市：探求堂，1983），頁 363-384。
-
- 52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94-95。
-
- 53 范永聰：〈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頁 95。
-
- 54 詳見龔紅林：〈屈原作品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討〉，載《雲夢學刊》，第 32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38-44。
-
- 55 朴晟義著：《韓國文學背景研究》，頁 553-554、556。
-
- 56 關於這種現象，范永聰撰有短文略作介紹。詳見范永聰：〈東亞的「狂人」——近現代韓、日兩國的魯迅形象〉，載《中國旅遊》，總第 505 期（2022 年 7 月號），「一衣帶水」專欄，頁 136-137。
-
- 57 楊昭全：〈李大釗、魯迅、胡適、歐陽予倩、蔣夢麟與朝鮮友人之交往〉，載楊昭全：《中國——朝鮮，韓國文化交流史》第四冊（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頁 1417。
-